

江南

文化研究

宋濂研究专辑

—第5辑—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江南 文化研究

宋濂研究专辑

—第5辑—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Jiāngnán Culture Studies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文化研究. 第5辑, 宋濂研究专辑/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77 - 3861 - 2

I. ①江… II. ①浙…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华东地区 ②宋濂 (1310~1381)—人物研究 IV. ①K295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4825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装帧设计: 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16

印 张: 16. 75

字 数: 450 千字

印 数: 0001—1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 00 元

编 委 会

顾 问 章培恒 章开沅

主 编 梅新林 王嘉良

执行主编 黄灵庚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家范 方卫平 孙 逊 吴福辉 陈玉兰

陈华文 陈国灿 胡晓明 俞樟华 高 玉

黄灵庚 潘富恩

目 录

略谈宋濂的诗论及其诗歌·····	胡浙平 (1)
明代浙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与演变——以宋濂、王守仁、徐渭为例·····	陈书录 (11)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张思齐 (16)
刘基与宋濂·····	吕立汉 (24)
宋濂遭难原因探析——从一篇张冠李戴的“佚文”谈起·····	孙小力 (31)
宋濂与江南文化在中国重要地位的确立·····	孙琴安 (38)
宋濂融贯众说集婺学之大成·····	徐儒宗 (41)
宋濂与佛学·····	许建中 李玉亭 (49)
宋濂与《元史》·····	刘尚慈 (57)
宋濂与龙泉章溢、胡深的交游——附宋濂佚文两篇·····	徐永明 (64)
论宋濂后期的诗文风貌·····	王魁星 (71)
宋濂《诸子辨》的学术定位与评价·····	黄震云 崔蕴华 (82)
评点学与宋濂诗学研究·····	徐华中 (88)
《龙门子凝道记》名义发微	
——兼论元末明初婺州作家外道内儒的文风·····	于淑娟 (95)
元末明初画家徐原甫考述——兼论宋濂《题徐原甫墨梅》·····	崔小敬 (102)
宋濂与岭南的渊源及其影响·····	周松芳 (107)
浅析宋濂的“帝师”心理·····	苏 萍 (113)
学佛然后能知儒	
——论宋濂道统思想及文学观的极端性与其佞佛的关系·····	申明秀 (119)
宋濂非从学于李大有论·····	龚剑锋 金晓刚 (128)
论宋濂入仕前的思想状态·····	朱晓玲 (136)
宋濂的史学思想与学术评论·····	向燕南 (142)
宋濂传记文的“小说化”与“史传化”错位融合及其文体意义·····	曾礼军 (158)
宋濂与戴良的关系兼及元明之际东南文士的交游风气·····	魏 青 (165)
关于《元史·礼乐志》的几个问题·····	许继起 (169)
宋濂佚诗文考辨·····	黄灵庚 (176)
宋濂杂记文探微——兼论对明清散文的开拓·····	何祥荣 (186)

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 常建华 (197)

家族资源及其现代价值——以浦江郑氏为例 梁敬明 (206)

60 年来宋濂研究述评 周明初 (214)

论越中派 李圣华 (220)

建文逊国志士著述考索 饶龙隼 尹炜明 (229)

元明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文学取向与思想选择 晏选军 (244)

许谦《白云集》成书及版本考述 慈 波 (255)

后 记 (261)

略谈宋濂的诗论及其诗歌

胡浙平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到宋濂的文学成就时，称其“诗不如文”。^①确实，他在散文方面的影响是要远大于他的诗歌的，朱元璋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也主要是着眼于他的散文方面，尤其是朝廷的典章制度方面的成就，曰：“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②这里面的内容虽然间或有些以四言为主的赞辞、铭辞之类，由于一般认为这些“辞”属于散文总体部分，所以其所评价的主要还是散文方面的。

其实，宋濂“自童年习为比兴之学”^③，学贯了包括《诗经》在内的“六经”。《浦江志》有如此一段记载：“（宋濂）九岁颇学为诗，有道士楼节翁至，或命赋诗为赠，濂操笔辄成四韵，有‘步罡随踢脚头斗，馥水能轰掌上雷’之句，众因目曰神童。”^④事情真假尚难考证，但是，说他从小就开始读诗、写诗，自幼就有作诗的禀赋与实践，应该是可以确信的。同时，他广泛阅读和研究古今百家之诗，自言：“濂非能诗者，自汉魏以至于今，诸家之什，不可谓不攻习也。缙绅先生之前，亦不可谓不磨切也。”^⑤至于论诗，宋濂也以为自己“论诗颇谓有一日之长”^⑥，只是因为他在散文方面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很少关注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直到这些年才有所改变。正是有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陋，愿参与讨论，以期引起对于宋濂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更多更深入的关注。

在现今留存的宋濂著作中，尚未发现有专门的如前人诗品、诗话那样一类诗歌理论著作，而他的诗歌理论都是散见于诸如作家作品集里的“序”、“跋”或墓铭、人物传记、书信等作品之中，因此，系统性或强或微，但是，汇集起来，却不难看出他对于诗歌理论的广视野、多方位的考量与论述，并从中体现出他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92页。

② 《明史》本传，转引自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宋濂全集》，第2268页。

③ 《震川集序》，同上书，第2025页。以下所引《宋濂全集》者，只注明页码。

④ 转引上书，第2699页。

⑤ 《答章秀才论诗书》，第207页。

⑥ 《樽散杂言序》，第2026页。

对诗歌的研究与表达。

何谓“诗”？宋濂认为，“以为诗者，发乎情性者也”。^① 诗是感情和本心的表现，“乃吟咏性情之具。”^②，是歌唱性情的载体。那么，是不是发之于性情就可以命之为“诗”了呢？宋濂认为这还不够，于是他进一步提出要“有感而发”才能成诗，而这个“感”就是“触于外物、托于外物”，所以，他又说：“诗，缘情而托物者也。”^③ “外触于物，内发乎情，情至而形于言，言形而比于声，声成而诗生焉。”^④ 这个“外物、内情”寓于一体而方能“成言、比声”而为诗的观点，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有其合理之处的。

何谓“好诗”？在宋濂的学术思想里，有两个方面特别突出，一个是“崇道”，一个是“明经”，而在他那里，“道”则“古道”，“经”即“六经”，“道”和“经”又是紧密相连的。他说：“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歿，道在六经。”所以，他认为写诗作文是不能“离经叛道”的，“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⑤ 因此，他为“好诗”亦即“美诗”立下的标准也首先是要合乎“古道”，承之《诗经》。他感叹：“诗道之不古久矣！”^⑥ 而其所谓的“古道”，说得比较多的是孔子说过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他在为河南王本中《霞川集》所作的序文里这样说：

诗其可学乎？诗可学也。然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而乎声切响，前后不差，谓之诗乎？诗矣，而非其美者也。辞气浩瀚，若春云满空，倏聚而忽散，谓之诗乎？诗矣，而非其美者也。斟酌二者之间，不拘不纵，而臻夫厥中，谓之诗乎？诗矣，而非其美者也。^⑦

以上“谓之诗”的三个方面，一是音韵节奏，二是辞章气格，三是把握有度，都是作诗所必备的，甚至也是一首“好诗”所不可或缺的，但是都被宋濂排斥于“美诗”亦即“好诗”之外，究其原因，无他，也只是不能合乎“古道”者而已。因此，他紧接着就说：

然则诗之美者其将何如哉？盖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情之所触，随物而变迁。其所遭也眇以郁，则其辞幽；其所处也乐而艳，则其辞荒。推类而言，何莫不然，此其贵乎止于礼义也欤？止于礼义，则幽者能平而荒者能戒矣。^⑧

归根到底，宋濂论诗是把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发乎情，止乎礼义”作为“美诗”的根本标准的。因此，他在感叹“诗道不古”的同时，大声批评了那些“世之号善吟者”，说他们“往往流连光景，使人驰鹜于玄虚荒忽之场，控之非有，挹之非无；至造为奇论，谓诗有生意，须人持之，不尔便将飞去。此何为者哉？殊不知诗者，本乎性情，而不外于物则民彝者也。舍此而言诗，诗之道丧矣！”^⑨ 这一“标准”的内涵固然比较狭隘，自然也有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使然，但是，论诗把内容放在第一位，这还是合理的。

① 《王氏梦吟诗卷序》，第112页。

② 《答章秀才论诗书》，第209页。

③ 《刘兵部诗集序》，第608页。

④ 《药房樵唱序》，第259页。

⑤ 《徐教授文集序》，第1351页。

⑥ 《霞川集序》，第2024、2025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霞川集序》，第2025页。

宋濂论诗重视内容，是与他对于诗歌功用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文章也罢，诗歌也好，都要有助于“美教化”、“移风俗”，所谓“气与时值，化随风移”。由此，他称赞汪广洋的诗歌“受丞弼之寄，竭弥纶之道，赞化育之任，吟咏所及，无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风俗”。又说：“此有关物则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谓台阁雄丽之作。”^①他肯定同郡田奂以孝行入诗是关乎大节的事，说“是诗之传，他日被之管弦，谐诸金石，使闻之者津津以喜，会之者欣欣以劝，则为移风易俗之益，又岂小哉？”^②他有感于“刘贤母王氏”身为寡妇而气节高尚以及当时的实际风气，将王氏比之于《诗经》中歌颂过的共姜，也有感于王氏亡故之后“当时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诗文以美之，命曰《贤行诗集》”，于是慨然叹曰：“今也贤母之志与共姜同。虽不自赋诗，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盖出于民之性，而先王之泽也，是宜刻梓传世，以为人妇者之劝。虽然，诗人之吟咏夥矣，类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虫鱼之句，作之无所益，不作不为欠也，华编巨册，摹印而行者比比有之，其视贤母之诗，有补名教者为何如哉？”^③强调“以为人妇者劝”和“有补名教”，指斥“烟霞月露”、“草木虫鱼”之诗，所倡导的则是诗歌的“教化”之用。客观的说，在那个时代，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好诗”仅仅在内容与功能，那么，这看法是肯定有失偏颇的，所以，宋濂论诗固然看重诗歌的内容与诗歌的教化作用，但他又并非不讲诗歌的艺术性。比如，他肯定天台方明敏所作“发于声诗，往往出人意表”，称其“古诗俊逸超群，如王子晋鹤背吹笙，随风抑扬，声在云外；律诗清丽婉切，譬犹长安少年，饮酒百华场中，莺歌蝶拍，春风煦然扑人，终日传杯，而醉色不起。”^④他一贯地崇尚《诗经》，所以也一再提倡诗要有“比兴”，因此对于取法比兴的诗歌与诗人总是给以鼓励与首肯。如，他称道金华许存礼之诗“取法比兴有近于古作者”。^⑤又如，他指出“古之人送别，多发为声诗，以致期望祝规之意。而唐为尤盛。然其为辞，托物以喻，盖得夫比兴之义为多”^⑥等。诚然，在诸种文学体裁里，诗比起散文来更讲形象性，要使得形象生动，用毛泽东同志与陈毅元帅谈诗时的话来说，比兴之法是不能不用的。

对于诗歌，宋濂还十分看重其中的“格力”与“气象”。比如，他批评“唐初承陈、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颓靡不振。”又肯定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指出：陈子昂能“专师汉魏”，“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他评价“王摩诘依仿渊明，虽运词清雅，而萎弱少风骨。”^⑦这些都是既着眼于诗歌的继承“风”、“骚”传统，又着眼于其中的“气象”与“格力”或曰“格调”的。

风格，同样是“好诗”的内在要求。因此，宋濂论诗其实也是注重诗歌的不同风格的，即使是同一个诗人的作品，他也指出了其中的风格的多样性。比如，他说建德马莹虽然“才气倜傥”，但科场失意，“于是悉发之于诗。凡身之所历，山容水色，民情物态，莫不模写靡遗。当其良朋胜友之集，辄酣觞赋诗，顷刻百余言，落笔弗能自休。虽不规规然骋工巧于片辞之间，而其音节之铿锵，言辞之俊逸，如扬飘大江，风利桅劲，一泻百里而略无留难之意。”^⑧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马莹诗歌特别是音节与语言的风格。又如，

① 《汪右丞诗集序》，第482页。

② 《田氏哀慕诗集引》，第499页。

③ 《刘母贤行诗集序》，第1172页。

④ 《东轩集序》，第1304页。

⑤ 《樗散杂言序》，第2024页。

⑥ 《题越士饯行卷后》，第2087页。

⑦ 《答章秀才论诗书》，第208页。

⑧ 《马先生岁迁集序》，第2029页。

他称和阳人王秉彝“轩冕之荣不足以羁其迹，贝珍之丽不足以累其高。肥遁遵《大易》之戒，知足法老氏之旨。吸清涧曲，采绿岩口”，“当其萝月斜映，松飙递响，寄酒赋于闲情，发琴歌于逸韵”，诗文汇成《乐善集》，“或寓诸赋咏，或纪于文辞。绝去下蔡之音，壹是大雅之倡。言其典雅，则冠冕佩玉揖让庙堂也；言其雄浑，则江海澄波涵容羲娥也；言其劲正，则苍官青士共傲岁寒也；言其淳古，则殷敦周醕有异衰器也。皆可遗芳不朽，垂裕后昆。”点明了王秉彝诗歌风格的丰富多彩。^①再如，他称陶渊明的诗歌是“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淡泊”、“平易”^②，说吴兴人林静“笃志濂洛关闽之学，寤寐不忘”，“文则丰腴雅驯，诗则藻丽典则”^③等，也都是他对于诗人们作品风格的评点。

何得而“为诗”？能“为诗”者在于诗人；能成为诗人者，也必定有异于非诗人的应有素质。宋濂在其诗论中不仅考索了“诗”的一般特点和“美诗”的一些特征，而且也十分注重探寻一个人能够成就为诗人的种种因素。比如，他在《林伯恭诗集序》里说过：“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④诗为心声，声因于气，而人皆有“心”，人皆有“气”，但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成为诗人，有些人则不能呢？按照宋濂的说法，是“随其人而著形”，换个说法，诗人是有“个性”与禀赋的，由此，宋濂又说：“必有颖悟绝特之资，而济以该博宏伟之学，察乎古今天人之变，而通其洪纤动植之情，然后足以凭籍是气之灵。”天资、博学、悟性、观察力，加之以“气之灵”，这才能成为诗人，才能作出诗歌。他的这一观点虽然注重个人主观因素，没有囊括作为诗人素质和能够作出诗歌的全部因素，但是如果联系到前面所述的他的“感物”之说，可以证明他的这一观点也是体现了相对科学与合理的因素的。

宋濂在《刘兵部诗集序》里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⑤的观点。所谓“五美”：一是“天赋之才”，说是“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二是“轨模百家”，认为“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三是“师友切磋”，云“功加矣，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四是“雕刻琢磨”，曰“师友良矣，非雕肝琢髓，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验其所至之深浅”；五是“得江山助”，说是“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这“五美”，兼蓄了诗人的才识、学养，创作态度，外物感触，论述简洁而又涵盖广阔，并且，已经涉及了诸如“究其施”、“择其精”、“浅深”、“性灵”等这些有关诗作的品位与情感问题，反映了宋濂对于诗人素质和诗歌创作的深刻见解。

二

宋濂的诗论能在纷纭繁杂的诗歌研究领域里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也对于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影响，别的姑且不论，只是看他的文集里有那么多人请他作序，求他发表对诗歌的评价及教诲，这不仅仅是因为看重他的“道德文章，蔚为一代真儒”^⑥，而且自然也是因为有感于他对于诗歌和诗歌理论的深厚造诣和深刻见地。这里，不妨探讨寻绎一下宋濂诗论形成的背景与渊源。

宋濂历经元蒙统治与朱明王朝，目睹了元蒙统治者对于汉人和汉文化的鄙弃，也目睹了一段时期以来朝野内外风气不古的现状。明朝开国之后，宋濂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饱读诗书的他自然会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来自勉和勉人。他的诗论，一方面是对以历代儒家所倡导的“礼仪之邦”为核心标准的

① 《王氏〈乐善集〉序》，第2030页。

② 《题张渤和陶诗》，第1678页。

③ 《愚斋集序》，第1859页。

④ 《林伯恭诗集序》，第1008页。

⑤ 《刘兵部诗集序》，第608页。

⑥ 何子祥：《重修学东宋祠记》，转引自《宋濂全集》第2374页。

千年古道的捍卫和兴复，另一方面又是他作为一个崇尚道学的文学家所同样具有的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的内在表露。前面所述的他对于诗歌以及诗人的一系列观点，都可以看作是这两个方面的集中反映。

在宋濂的学习生涯中，他在自身嗜学苦读的同时，又曾经直接师从当时的教育家闻人梦吉和被称为“当代大儒”的黄溥、柳贯和吴莱，他们对于诗文的观点不能不对他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宋濂在论述黄溥的学术成就时说道：“先生之所学，推其本根则师群经，扬其波澜则友迂、固”，其学术“精明俊郎，雄盖一代，可谓大雅不群者矣”，其文“上而六艺，下而诸家言，所倡虽有大小之属，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犹津津然”，“追念畴昔（自己）侍几杖华川之上，先生酒微醺，历论文辞，原乎学术，每至数百言。”^①再联系到他说过的作诗需要“良师友”的切磋讨论的观点，我们是不难想见前辈先生论诗论文的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的。

宋濂虽然反对有“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判，秉持的是“儒者之诗”的观点，否认有“诗人之诗”，这固然是他论诗的一个局限，但是，既要论诗，那么，在客观上他又不得不言及历代诗人，不得不关注“诗人之诗”，评论家有时确也会有理论和实际不相一致的矛盾，因而他的诗论也的确是在大量阅读前人诗作基础上所得出的感悟与总结。这在他的《答章秀才论诗书》中就可以看出。在这里，他说了“三百篇勿论矣”，于是从苏武、李陵，建安的“三曹”、刘桢、王粲，正始的嵇康、阮籍，太康的陆士衡兄弟诸名家和左思、张翰，然后说到陶渊明、“元嘉以还”的“三谢、颜、鲍”以及之后的沈约、江淹等作者，接着言及从初唐到晚唐的大批诗人，最后评价北南两宋如晏殊、杨亿、苏子美、梅圣俞、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江西诗派”、中兴四大诗人直到宋末之诗人，仅仅由此，人们就不难体会到宋濂是读贯古今之诗的，更何况与他差不多时期的大量元明时人的诗作呢？也正是因为品味了诸家众作，所以他才能比较中指出各人各家的承继渊源和崇卑高下，尽管他的品评标竿是唯“古道”所准，所下的结论在今天看来也未必都是准确公允的，但至少有自己的识见与观点。也就是在他的《答章秀才论诗书》中，宋濂针对章氏“疑历代诗人皆不相师”之论，由此及彼，议论风发，提出了“诗之格力”会“随世而变迁”和诗人皆“相师”的诗评主张。比如，他说苏、李之诗“纤曲凄婉，实宗《国风》与楚人辞”，说正始诗人嵇康、阮籍“师少卿而驰骋于《风》、《雅》者”，说“沈休文拘于声韵，王元长局于褊迫，江文通过于摹拟，阴子坚涉于浅易，何仲言流于琐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丽为宗，诗之变极矣。”接下来论述历代诗人，宋濂主要也是指出他们对于前人的有相有变——亦即“相师”与“变迁”，他说道：“诗之格力崇卑，固若随世而变迁，然谓其皆不相师，可乎？第所谓相师者，或有异焉。其上焉者师其意，辞固不似，而气象无不同；其下焉者师其辞，辞则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尝近也。然唯深于比兴者，乃能察知之尔。”^②如此来论述“相师”，又把他关于作诗需要“五美云备”中的“师友切磋”之“师”的内涵进一步扩大，而最后仍然又是归结到了作诗要轨模《诗经》、深于比兴的观点上。

宋濂的诗论同时也继承了历代论诗者的传统，进一步丰富了前人的理论。比如，他强调诗歌要能补世教、移风化俗，这是他对于孔子“思无邪”、“兴、观、群、怨”，以及刘勰“原道”、“征圣”等前人思想的继承。他主张取法“六经”，认为“文学之事”“当以圣人之文为宗”^③，他说过：“君子之言，贵乎有本，非特诗之谓也。本乎仁义者，斯足贵也”，称许林汝文能够师法《诗经》，从中学习先王之政教、贤人之性情之正与道德之美，治身而“醇如”，“形乎诗”则“其词粹如也”。^④这些观点其实是源自于汉儒及

① 《金华先生黄文献公文集序》，第1985、1986页。

② 《答章秀才论诗书》，第207、208、209页。

③ 《浦阳人物记·文学篇》序，第1838页。

④ 《林氏诗序》，第1729页。

后世诸儒，也包括刘勰主张的“崇经”之说。正如他对于诗歌之“气”的论述，也是上继孟子、曹丕诸人而又有自家之得的。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孟子说的“气”，是得之于天地、贯之于心胸、凝结于人之精神的广大之“气”，是如后来文天祥所说的“天地有正气”。曹丕说的“气”主要是指诗文中表现的“气息”，如舒张、郁积之类，或者说是“贯通”、“舒畅”、“阻滞”、“扞格”等类。宋濂即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把这“气”扩充为气质、气象、气韵、格调等。比如，他称柳贯的气质是“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严若神”，“为文章有奇气，春容纤徐，如老将统百万雄兵，旗帜鲜明，戈甲辉煌，不见有喑呜叱咤之严。”^①又如，他批评“世之学诗者众矣，不知气充言雄之旨，往往局于草木虫鱼之微，求工于一联只字间，真如苍蝇之声，出于蚯蚓之窍而已。”^②此“气”又是指做人作诗的格调与品位了。再如，宋濂关于诗歌的“性情”、“感物”、“雅正”、“教化”等理论，则是对《诗大序》和朱熹《诗集传》等前人论诗者的继承与发展。如《诗大序》说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可以“美教化，移风俗”。朱熹则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歌咏之余者”^③。宋濂明确认为汉代序《诗经》之人是“后世训诗者之楷式”^④。又比如，他论诗人诗作的风格，也从前人诸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诗论中吸取了一些观点。

宋濂说过：“为文非难，而知文为难。”^⑤又说：“诗之为学，自古难言。”^⑥其实，作诗知诗论诗都是难事，故自古以来真能为之者也是不多的，能够让人接受者则更加不容易了，宋濂论诗虽也揣摩百家，但并没有步趋前人而止，而是把它们熔铸于自己的思想之中，语由己出，因此，不用说当时的人，即便是我们今天来读他的诗论，也仿佛身临其教，是颇能有所得的。

三

宋濂的诗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在于他自身有着诗歌创作的实践和体验。他的诗歌，就目前所见，在数量上远少于文，影响也远没有散文那样大，但是，他的诗歌也有自己的成就和影响。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就说过：“宋景濂、王子充虽以文名，而诗亦严整妥切。”^⑦沈德潜编诗有严格要求，但在《明诗别裁集》里也收入了宋濂的诗。郭绍虞先生说，宋濂的诗论对于前后七子的影响“多少有些关系”^⑧。明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潮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宋濂白云“复出新篇什，自谓宗汉魏”^⑨，对于这一复古思潮的形成，他应该是产生了影响的。

宋濂的诗歌，就其内容来看，有部分应是应制诗，尽管也有情境与格式的要求，但自然多应景与颂德之作，可以先抛开毋论。除此之外，再看他的其余诗作，题画、抒怀、写景、送别、酬人、怀古、感遇等，也还是很有覆盖面的。

① 《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第120页。

② 《林伯恭诗集序》，第1008页。

③ 朱熹：《诗集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④ 《杜诗举隅序》，第1086页。

⑤ 《丹崖集序》，第490页。

⑥ 《清啸后稿序》，第489页。

⑦ 见《宋濂全集》，第2676页。

⑧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页。

⑨ 《游径川水仙寺……》，第2203页。

宋濂在元蒙统治时期，“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①反映了他对于元蒙统治的不合作之态，这是他强烈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他曾评论合肥人余廷心“文与诗皆超逸绝人，书亦清劲，与人不相类。然其忠义之气可以惧乱贼，清恶厉”^②。在宋濂自己的诗歌里也同样表达了对于戍边抗战的将士们的赞颂与敬仰，寓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于其中。比如，他的《题李广利伐宛图》^③：

贰师城头沙浩浩，贰师城下多白草。六千铁骑随将军，风劲马鸣高入云。师行千里不畏苦，战士难教食黄土。上书天子引兵还，使者持刀遮玉关。乌孙轮台善窥伺，宛若不降轻汉使。玺书昨夜下敦煌，太白高高正吐芒。戍甲重徵十八万，居延少年最翘健。杀气漫漫日月昏，边尘冉冉旌旗乱。水工决水未绝流，旄竿已揭宛王头。执軀校尉青狐裘，牝牡三千聚若丘。惜哉五原白日晚，邛居水急游魂返。

这是一首题画诗，史实是李广利最后还是终至战败而投降匈奴了，是耶非耶，暂且不论，但这首诗对于李广利是作了正面表现的，诗既写出了边战的艰难困苦，更叙写了汉军将士的英勇善战、威武不屈，末后的“惜哉”二句，则表示了对将士结局的惋惜。

又如《答胡将军》诗云：“将军去征蛮，军气如鹰扬。宝剑白玉缀，铁马青丝缰。旌甲带亮月，笳箫激清商。韩彭当后拒，褒鄂作前行。顾盼多姿态，出入生容光。奋迅东海滨，海水为腾骧。定如汉贰师，去缚楼兰王。想见凯旋时，横槊赋篇章。椎牛飨壮士，歌之侑行觞。功勋名鼎鼎，永世不能忘。”^④诗当是酬答明初著名将领胡大海的，据《明史·列传第二十一》：“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长身，铁面，膂力过人。”一生为大明朝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善用兵”，自言“不杀人，不掠妇，不焚毁旅舍”，“又好士，所至辄访求豪俊，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之见聘也，大海实荐之”，死后，朱元璋亲下诏书上谥号，“追封越国公，谥武庄，肖像功臣庙，配享太庙”。诗歌前半首写将军的勇猛与英姿，后半首写作者的想象与祈愿，全诗虎虎有生，一无萎靡之气，与“诗主”自言“吾武人，不知书”的胡将军又情境相谐。

再如他的《题宗忠简公诰》^⑤一诗，虽然是因为王黼“书名诰上”所作，但写出了中原板荡和忠勇乡贤、民族英雄宗泽的高风亮节，“君不见汴京礼乐正全盛，江南杜宇啼天津”，寓英雄的结局于民族的哀痛之中。诗赞颂宗泽，把其置于抗金的大背景来写，开头就说：“青城妖侵连云赭，犬羊在都龙遁野。百年艺祖旧河山，万骑长驱若冰解”，而宗泽则是“君侯心事汉武侯，伟气英声冠千祀”，诗又对当道奸臣作了鞭挞，所谓“吁嗟黼黻真奴臣，贼君致寇肥其身”。诗中写宗泽是“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风萧骚。起扶白日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涛。义旗夏天天为泣，四方猛士闻风集”，“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舆不顾东南巡。拊床三叫大星落，非天弃宋良由人”，字里行间，爱恨分明，诗句流利，英气逼人。

宋濂长期生活在民间，对人民甘苦有直接的了解，作为典型的儒者，他对于社会曾经的战乱和灾难、人民所受的痛苦和磨难也都有自身的感受。“有时念下土，临风动哀叹”^⑥，“我歌何太苦，触事增百忧”^⑦。

① 《明史》本传，见《宋濂全集》第2265页。

② 《题余廷心篆书后》，第1577页。

③ 《题李广利伐宛图》，第1953页。

④ 《答胡将军》，第1947页。

⑤ 《题宗忠简公诰》，第1621页。

⑥ 《和刘伯温秋怀韵》，第2221页。

⑦ 《忆与刘伯温同上江表》，第2211页。

他的《送刘赞府之官都昌五十韵》^①一诗，先追溯了都昌的历史与地理环境，描绘了它曾经的繁华与安宁，说是“居然风气会，生聚密如织。名区列象犀，高楼发箫笛。酒帘杏花园，渔市萍洲栅。”然而一旦遭遇不测，大火一炬，可怜焦土，这些都霎时不复存在了，于是，作者写道：“连云六千家，一炬半天赭。积尸成陂陀，冻血凝洛泽。瑟瑟骷髏语，多在风雨夕”，画出了一幅大灾大难的凄惨图。刘君就是在都昌复建的同时走马上任的，此君儒雅魁伟，有奇才，作者期望他“应能不负丞，奇略肥民瘠”，“勿升元辰山，去踏马蹄石”。都昌离陶渊明归隐的地方不远，理应可前去瞻仰，但作者告诉刘某：“仕隐各有心，忘世非良则。当如陈大夫，树陂寿民脉。令名垂无穷，晴波共洋溢”，连同对于刘氏在读书、写作、休闲等方面的叮咛嘱咐，诗写得委婉有致，入情入理。

如同他的诗论一样，宋濂也将他对于“古道儒风之不存”的感叹写进了诗里，希望兴复古道，所谓“当持六经炼为药，尽疗天下苍生瘳”^②，“研穷阴阳序政事，吟咏情性臻和平”^③。比如他的《示吕生》^④一诗，序文则曰：“六经之后几无文矣，近世学者专攻浮褥之章，动以鼓吹六经为辞，予实病焉。因为吕生赋此，以药矜文而丧德者。”在当时的背景下，这颇有些挺身跟“矜文而丧德”之世风抗争与战斗到底之意。诗中说道：“曷以七尺躯，不解分白皂？末俗狂澜奔，湖江决堤堡。郊原化巨浸，何地有桑枣。鱼鳖舞神奸，庐舍作舟岛。非加回障功，未易就平燥。只缘正学微，本末遂颠倒。”这是全诗的其中一段，从中可以见出他所认为的“时弊”之严重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强烈幽愤。

宋濂说过：“牵情缀思，莫难于别离；感物成声，莫逾于歌咏”。^⑤在他现存的诗歌里，送别的作品不是很多，但往往表现真情实感，款款动人。比如《走笔送金贤良》^⑥：“飘零已觉二毛侵，且向西风问苦吟。延雨蛮烟十年梦，龙韬豹略一生心。星垂钟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海深。不是秋帆连夜发，典衣呼酒共登临。”诗以七言律为作，首联感慨深沉，中二联有回顾有寄托，尾联情真意切，朋友挚谊呼之欲出。全诗揆却儿女情长，亦无一般送别时惯有的凄惨之态，深情而旷达。

再如他的《题方生孝孺还天台诗》^⑦，全诗十四章，五十六句，用的是五言古体。方孝孺是宋濂的弟子，与宋濂情同父子，甚为宋濂所赏识。宋濂在本诗诗序里开头就说：“古者重德教，非唯弟子之求师，而为师者得一英才而训饬之，未尝不喜动颜色”，指出向其求经者“每有其人”，而“晚得天台方生孝孺，其为人也，凝重而不迂于物，颖锐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出。喧啾百鸟之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因此当方孝孺“别去”之际，先生“因发于声诗一十四章以送之”。诗的首章写分别之时的寒冷天气；二三章是对方孝孺初来时的回忆，言其“才思”斑斓，秀出诸生；四十五章写自己获得秀杰之才的欢欣与师生共学的忙碌及愉悦，说是“得之喜欲舞，如获宝璐然”，“探玄欲忘寝，荐味如啖蔗”；六七两章写的是别时的惆怅与无奈之情，所云“一朝别我去，何以释离忧？”“但愿逆风起，吹舟不得住”；八章是个过渡，说既然老天不能遂人愿，那么只能在离别之际说一番“如赠金”般的“赠言”了；九章至十三章就是他对于爱生的教导与嘱咐，其中九章说的是要坚持学习，不要功亏一篑，十章说的是要参透“六经”，不能“徒溺文辞”，第十一章和十二章希望方氏勇于卫“道”，坚定信念，不可随同流俗，而是要像泰山的“乔松”一样，“老杆凌苍霞”；最后一章写盼望明年春花正开的时候能够再来重聚。全诗蜿蜒逶迤，有回

① 《送刘赞府之官都昌五十韵》，第2198页。

② 《天麦毒行》，第2206页。

③ 《秋夜与子充论文》，第2209页。

④ 《示吕生》，第1954页。

⑤ 《送胡判官西迁诗序》，第2033页。

⑥ 《走笔送金贤良》，第1964页。

⑦ 《题方生孝孺还天台诗》，第1961页。

望，有褒奖，有嘱托，有期望，既波澜跌宕，又首尾圆合。

宋濂在《游钟山记》一文中说过：“山灵或有知，当使予游尽江南诸名山，虽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① 自言“我生素有山水癖，向之不觉开心颜”^②。同时，他又善于写景绘形，他的一些游记散文，寥寥几笔，就能生动地表现出山水景致的风神所在，他诗歌里的一些写景之作，也有这个特点。比如，写泰山的“峤绕泰岳拄苍穹，万壑千岩一径通”，“凌晨云漫天涯白，子夜晴摇海日红”^③；写濮川八景的“太古烟霞错绣盈，拍天苍翠纛虚明”（福善翠冷），“踏穿清浅水云奔，皓日当空雪满村”（梅径花舞），“落日半竿花未睡，采莲人逐钓船归”（荷陂晚风），“霜花零落暮秋寒，一醉西风树叶丹”（化坛枫映），“苍冥不挂一帆丝，两岸渔歌月上迟。看破婵娟全面目，菱花无语笑冯夷”（幽湖月满）^④。又如写春日绣湖的“雨花林下寺，风柳驿边楼。漠漠芙蓉浦，依依杜若洲”^⑤，等等，都写得生动传神，呼之欲出。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关于宋濂诗歌的艺术成就，这里不打算一一评价，而只是想就他诗作的语言特点谈一点看法。宋濂论诗推崇《诗经》，因此他有些诗歌的语言显得比较古奥，特别是那些四言体的（从广义上说，那些碑铭或有些序文中末后的“四言”文也是可以看作是诗歌的），而且，由于过分强调教化，有些诗歌的语言也不免失之于枯燥乏味，但是，他的不少诗歌的语言总体上也还比较平稳妥帖，明白晓畅，琅琅上口，这与前面说过他善于广泛学习古今之诗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些诗歌特别注明“拟古”（如《拟古二首》）、“拟宫体”（如《和胡古愚拟宫体》），有的则标明“效唐人体”（如《艳阳词三首》）、“效白乐天体”（如《义侠歌》），但是，模拟不等于模仿，模仿是不讲创造，如同鹦鹉学舌，所以作品一无价值，模拟则是效仿其体而自创诗歌的作意。比如他的“效唐人体”的《艳阳词三首》之二：“九子金铃出九龙，流苏杂彩出芙蓉。东风不管花无力，吹满昭阳第一宫”，^⑥ 即使放入唐人的宫词里，也是不为逊色的。又如他的“效白乐天体”的《义侠歌》^⑦，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宋金时期一位宣和进士董元卿的无情和无名氏兄妹的侠义，说董氏因为中原沦陷后，隐姓埋名入住旅舍，旅舍主人怜其孤独，买来一名貌美手巧、有情有义的姑娘陪伴董氏，当董氏提出要回南方看老母时，姑娘又亲手制作衣袍并叫来自己的哥哥带重金护送董氏回家，谁知董氏家里尚有妻儿，而其妻又有些凶悍，那姑娘来看董氏，颇遭难堪，董氏却无能保护她，于是，姑娘不辞而别，决然离去。诗用的是叙事体，遣词造句也富于叙事意味，因此，全诗很有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那样的波澜曲折，引人入胜。

宋濂在注重向前代文人学习的同时，也善于向民歌的语言学习，如《越歌约杨推官同赋八首》中的“劝郎莫贪赏湖鱼，劝郎莫弃别时衣。湖中鲤鱼好寄信，别时衣有万条丝”，“阿侬羞杀黄帽郎，桂舟兰楫藻中藏。芦竹生花秋满地，棹歌才动便寻榔”，“春望山头松百株，若耶溪里好黄鱼。黄鱼上得青松树，阿侬始是弃郎时”，^⑧ 等，很有古乐府特别是南朝乐府的风韵，语言质朴，读起来趣味盎然。再如他的《题五云书院壁》中的“竹山青，梅溪绿，溪绿山青原不俗。梅溪缭绕竹山旁，竹山屹峙梅溪曲。梅溪绿，竹山青，溪绿山青原有情。竹山永结梅溪社，梅溪长固竹山盟。”^⑨ 这样的诗句，语言回环往复，垒垒如贯珠，而

① 《游钟山记》，第211页。

② 《画山水图歌》，第2213页。

③ 《登岱》，第2223页。

④ 《濮川八景诗》，第2222、2223页。

⑤ 《春日绣湖与德元同行》，第2224页。

⑥ 《艳阳词三首》，第2204页。

⑦ 《义侠歌》，第2207页。

⑧ 《越歌约杨推官同赋八首》，第2201页。

⑨ 《题五云书院壁》，第2225页。

且，明白如话，简直就是一首山歌。不过，由于过分追求对于“道”的表现，宋濂不少诗篇的语言确也显得有些枯涩而有损诗歌应有的韵味。

在诗歌的体制方面，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体、近体，宋濂的诗作中都有过尝试，而且也大都入其肌理。特别是五言，数量上更为多些，结章构句，也往往得汉魏诗家的风致。至于四言，虽不止见于碑铭一类文体之中，单篇独曲的也有，但相对较少，拿他《题张渤和陶诗》文中所说的是“诸四言及《形神释》《桃源》等什则不和，恐难继也”^①，是否连宋濂自己也认为“难继”而少作，即未为知矣。

作者简介 胡浙平，浙江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

^① 《题张渤和陶诗》，第1677页。

明代浙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与演变

——以宋濂、王守仁、徐渭为例

陈书录

浙江文学在明代文学发展中有重要的地位，呈现出多彩多姿的风貌，其中商贾与文学的互动也颇有特色。在商贾与文学的互动中，元末明初的宋濂、明中期的王守仁、明后期的徐渭以各自不同的色彩，勾画出明代浙江文学演变的轨迹。

浙江是商贾活跃的地区，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有浙江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元末明初的宋濂（1310～1381）深受商贾之风的影响，他的诗文中时有士商互动的亮色，大致五个方面：一是塑造善贾及商人妇形象。在《送吴仲实还金溪序》中展示了他理想中“善贾”的形象：“仲实不见夫善贾乎，当众人竞取之时，则弃之；竞鬻之时，则置之。其不取则已，取必穷海内之珍；不鬻则已，鬻必获巨万之富矣。”^①人取我弃，人弃我取，而且“取必穷海内之珍”，“鬻必获巨万之富”，这就是宋濂眼中的“善贾”。他在《题吴节妇诗后》（《宋濂全集》）中塑造贞节又能文的商人妇形象：“临川吴节妇黄氏贞而甚文”，“夫泰发贾死江湖间，二子、一女幼，黄氏苦心瘁形，慈鞠严教，诗其教之一端也。余诵其辞，愈叹异焉。妇人之不贰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间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②二是揭露刁商、奸商的嘴脸。《元故方府君墓碣铭有序》中将刁商贱称为“贾竖”，说墓主方应元为刑曹史时遇到“豫章二贾竖，挟人与之仇，欲以伪造钞诬之”，方应元便加以痛斥：“讯狱当两造具备，人奈何受尔诬？祸将不测矣。”结果“一听一不听。听者免，不听者果抵死罪。”^③《送翁好古教授广州序》中抨击“行贼觅荐”、扰乱学风的商贾：“近代以来，急于簿书期会，而视教民为悠缓。可学计者，以岁月序迁。豪右海商，行贼觅荐，往往来倚讲席。”^④三是通商利民。《大明故王府参军追封缙云郡伯胡公神道碑铭》中说胡深在任浙东行省左右

① 《朝京稿》卷2，《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7页。

② 《朝京稿》卷2，《宋濂全集》，第1664页。

③ 《翰苑续集》卷4，《宋濂全集》，第848页。

④ 《翰苑别集》卷1，《宋濂全集》，第970页。